

主 编 褚钰泉 一 本 关 于 书 的 书 阅 读 趣 味 尽 在 其 中

于是之与北京人艺『小作协』

徐佛观，

国民党少将观察员的延安观

冰心的文坛是非和选择记忆

读陈白尘在『文革』中写的『认罪书』

时风所趋

卢梭先生

从台湾『叛逃』而来的经济学家

张思之谈律师工作

腐败，使国民党丢失了政权

现在还不能完全说出来

MOOK

第二十九卷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29

Mook

第二十九卷

主编 / 褚钰泉 一本关于书的书 阅读趣味尽在其中



29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悦读MOOK. 第二十九卷/褚钰泉主编.--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2.10

ISBN 978-7-5391-8135-6

I. ①悦… II. ①褚… III. ①书评-选集 IV. ①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09017号

悦 读MOOK (第二十九卷)

主 编 褚钰泉

责任编辑 熊 焱 张海虹

特约编辑 林 韵

美术编辑 徐 泓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25)

yuedumook@126.com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30mm×1092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9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91-8135-6

定 价 2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卷首语

北京人艺创立至今已整整一个甲子，本卷刊登郭启宏先生的文章《于是之与北京人艺“小作协”》，以示祝贺。

在中国当代文化史上，北京人艺书写了灿烂的一章。这是一个颇有特色的文艺团体，说其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或许有些武断。但纵观北京人艺六十年的历史，无论刮什么风，其办院宗旨最终都没变，始终能一以贯之地坚持自己的艺术主张和风格，为观众留下了如许久演不衰的剧目，拥有如许享有盛誉的第一流演员，这样的评价绝非妄言。

近年来，一直在呼唤文化的大繁荣，有关部门也是煞费苦心，口号喊得震天价响，资助的钱哗哗而流，仿佛有了豪言壮语，有了钱，就会出现好作品，就能培养出类拔萃的人才。然而事与愿违，且看舞台和荧屏上，灯光布景无比炫丽奢侈，演出排场日益庞大豪华，可是观众却过目即忘，未能留下什么印象。

衡量文化是否繁荣，关键在于能不能创作出经久耐看的传世之作，有没有为之矢志终身的一流的创作人才。郭启宏先生文中介绍于是之先生抓创作的经验，似颇值得文化部门的领导借鉴。六十年来北京人艺经受时代风雨的洗礼，积累了一批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优秀剧目，几十年前演出时盛况空前，而今依然一票难求，新创作的剧目常常赢得满堂彩。何以如此？其中的甘苦艰辛，颇值得细细琢磨推敲。相比近年某些作品，赶时髦，奔“钱”途，甚至不惜媚俗，有的可以热闹一时，但随着风向的变化，顿时黯然失色。由这些作品堆积起来的文化，难言繁荣。

文化艺术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认定目标，全力以赴，耐得寂寞，不计名利，不慕“钱”途。北京人艺的经验似可说明这一点。演戏如此，出版、办刊物、创作、歌唱、跳舞……又何尝不是如此？！

目 录 Contents

特 稿

- 于是之与北京人艺“小作协” 郭启宏 / 005
徐佛观,国民党少将观察员的延安观 朱鸿召 / 011
冰心的文坛是非和选择记忆 张耀杰 / 025
为构建钱锺书学术体系作贡献 陆谷孙 / 033

人物志

- 陈白尘与《人民文学》
——读父亲于“文革”中的“认罪书” 陈 虹 / 034
“我不是红学家” 范玮丽 / 042
张仃拜师齐白石 李兆忠 / 048
吴稚晖与章太炎何以成死对头? 蔡登山 / 054
抗战前期的傅斯年与胡适 李传玺 / 059

忽然想到

- 时风所趋 陈四益 文 黄永厚 图 / 068

闲话出版三十年

- 何炳棣教授《读史阅世六十年》出版缘起 陈万雄 / 072

书与插图

- 卢梭先生 汪家明 / 076

域 外 风

- 历史有规律吗? 萧文泉 / 085
从雅科夫列夫向科尔总理索要“战争赔款”说起 述 骏 / 091
劳伦斯与伦敦:此恨绵绵 黑 马 / 095

艺苑杂谈

《武训传》留下的记忆

彭小莲 / 104

“老照片”札记

曾经的“蜜月”

冯克力 / 108

海外书情

一位智者的思想历程——挑战科学的人——苏联是怎样垮台的？——契诃夫一家——基督教欧洲的诞生——越战的教训——争取核裁军——尼采在美国

/ 114

书海巡游

► 有此一说 ◀

省级常委中博士占据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接近两亿三千万——我国有百分之十的耕地中毒——大陆高中生尖子纷纷去香港——三位华人获美国“青年科学家总统奖”——腐败人数越来越多案值越来越大

/ 121

► 人物志 ◀

从台湾“叛逃”而来的经济学家林毅夫

刘世英 / 124

飞船上天的几个插曲

陈祖贵 / 133

做一个有担当的律师——张思之谈律师工作

张帆 / 139

林彪的婚事

田涌 / 144

沈从文、郭沫若和丁玲

刘红庆 / 148

奇人曾希圣

高金虎 / 152

► 历史往事 ◀

- 李克农和潘汉年案件 开 诚 / 155
- 腐败,使国民党丢失政权 李振广 / 161
- 写给党中央的一封匿名信 明 朗 / 164
- 我参与了打倒陶铸 阎长贵 / 168
- 美国总统来了 李 杨 / 171

► 内情参考 ◀

- 现在还不能完全说出来 张 卓 / 174
- 和平年代的中日情报战 雷 雨 / 178
- 逐步解禁的《金瓶梅》 张远方 / 181

► 信息荟萃 ◀

- 中国人赴美的几种结局——越南侵占了中国南海二十九个岛礁——来之不易的“依法治国”——中共最高领导称谓的历史变迁 / 185

► 四面八方 ◀

- 我不喜欢中国的十大理由 [韩] 金宰贤 / 191
- 一枚“文革”邮票的意外走红 周 冉 / 195
- 灰霾背后的环境危机 张墨宁 / 199
- 得数据者得天下 涂子沛 / 202
- 地痞流氓的“时尚”——中国古代的“刺青” 刘紫云 / 204

于是之与北京人艺“小作协”

◎郭启宏

说北京人艺“小作协”，当是戏言。“作协”之于中国，至少是半官方机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不过一家剧院，哪来这般“谱大”？虽说戏言，无妨畅想。北京人艺有个创作室，前称剧本组，后改文学处，难道不能办成剧作家精英荟萃之地？如斯畅想之始作俑者是于是之。



于是之先生

于是之时任剧院的第一副院长（院长曹禺，人艺的精神领袖），统摄剧院大局，首要是剧目生产，尤其是剧本。他没有重复“剧本剧本，一剧之本”这样缺少新意、被貌似内行的人说烂了的调调，他说了一句让剧作家为之振奋的话：“请观众允许我代表他们感谢这些用笔支撑着剧院的人们。”（引自《贺何冀平同志》）“用笔支撑着剧院”比之“一剧之本”更准确，更生动，

更形象，更诗意，也更具人文情怀。基于这种思路，于是之上任后便致力于人艺创作群体的整合与重构，向高端化努力。

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初，于是之一直在经营这个创作群体。除了原先的“老人艺人”刘厚明、蓝荫海、梁秉坤、王志

安……又先后引进了“新人艺人”高行健、李龙云、刘锦云、王梓夫、何冀平和我。我是一九八九年秋调入人艺的，最后一位。记得当年于是之在例行谈话时候对我说，你的到来别有一番意义，你搞历史剧，北京人艺的“小作协”成型了！我很能感悟他的兴奋，这个“小作协”既不是杂乱的拼凑，它必须与剧院整体的演剧学派相适应；这个“小作协”也不是单一的风格，它

必须高扬剧作家各自的创作个性,真正做到“同中有别,异里能和”。观众的体认常有误区,以为人艺的戏就是京味(姑且不说京味这一概念是否科学),其实人艺的演剧风格不是一个京味所能涵盖。早先的“郭、老、曹”(郭沫若、老舍、曹禺),即便算“老”入了京味,“郭、曹”也属京味? 在于是之



作者郭启宏(右一)与于是之、林连昆两家合影

惨淡经营的“小作协”的众多作品中,固有北京市井的,也有外地农村的,更有实验戏剧、历史新编。当然,广义的“小作协”还应包纳不在人艺编制却为人艺写戏的剧作家,如苏叔阳、中杰英、孟冰、过士行等。评论界普遍认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北京人艺剧目出现建院以来第二次辉煌,苏叔阳的《丹心谱》、梁秉坤的《谁是强者》、高行健的《绝对信号》、魏敏、孟冰等的《红白喜事》、李龙云的《小井胡同》、刘锦云的《狗儿爷涅槃》、何冀平的《天下第一楼》、郭启宏的《李白》、过士行的《鸟人》……这一长串剧目无不闪烁着人性的亮色、艺术的光芒,既有独特的不可替代性,又都打着“made in renyi”的艺术印记。此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于是之心里最清楚。

依我之见,是于是之为北京人艺造就了一个良好的创作生态环境的“小气候”。长久以来,全国剧院团所处的社会“大气候”,固非剧院团领导者所能更易,而一院一团所处的“小气候”,至少可以“微调”,当然,你得遇到于是之这样的领导者。(北

京人艺人大多认为于是之从政是他演艺生涯的悲剧,我然此说;若从北京人艺的剧目建设看问题,则他之从政又是编剧们的大幸,也是北京人艺的大幸,蜡烛不正是这样燃烧自己、释放光热的吗? 令我感到悲哀的是,于是之在当今几乎成了个案,成了孤证,成了特例!)于是之作为一种人文现象,很值得理论界认真研究。本文仅就北京人艺“小作协”旧事略述几端。

一曰不命题作文。

我对当代中国舞台编剧的生存状态略有了解,举凡剧院团领导大都自诩有权力、有资格领导创作,发号施令当是屡见不鲜的事,唯于是之独非。他对“抓创作”一词颇为反感,他说,“作品不是什么人抓出来的,而是作者写出来的。我觉得这个观念很重要,不好颠倒了。”(引自《北京人艺剧本组的工作》,下同。)我在北京人艺这么多年,从没听说过他给哪位编剧命过题,即使上级领导多次下达命令,他也要征得编剧的同意,他说创作是“有感而发”,他从不勉强编剧,遑论强迫!



于是之在《茶馆》中的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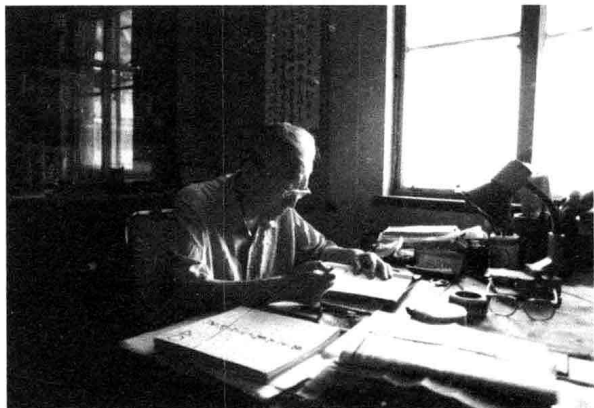
编剧们进入创作的过程各不相同,有的人愿意谈谈提纲,听听意见,每当此际,老于总是兴奋有加,乐此不疲,似乎倒是在他编剧;有的人习惯不同,不愿意过早公诸世人,他也不催促,静候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比如我吧,创作状态来临,自信复自负,情绪却十分脆弱,一句否定的意见,会毁掉一部经营多年的作品,“彩云易散琉璃脆”!所以我不谈提纲,一出手便是成品,于是之理解我的习性,使我的“另类”方式得以保留至今。《李白》《天之骄子》等剧都是初稿“出笼”他才知道,他没有嫌我对他保了密。

观众从舞台上认识于是之,却很少从文字上了解于是之,他戏演得好,文字功夫也了得。他的散文看似质朴无华,其实含蓄蕴藉,大雅能俗,每见诗意,《幼学纪事》一文早已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他也写剧本,他是《胆剑篇》的编剧之一。正缘于此,他谙熟编剧心路。他说,“创作,是创造性的工作。这就决定了他们(指编剧)总不能太‘安分’,总要探索点新东西。既是探

索,就会有成有败,有得有失,有对有错。”又说,“宁愿要有生活底子,有真情实感,哪怕结构上披头散发,还没个模样,甚至思想倾向上还有点毛病的稿子,也不要‘七巧板’拼得无懈可击、冷冰冰无真情的稿子。”他是真正的行家!比起当今牛哄哄的这“官”那“长”,不啻霄壤之别。看官试想,倘若命题作文,北京人艺能有《绝对信号》、《小井胡同》、《狗儿爷涅槃》和《李白》吗?

二曰不当教师爷。

大凡舞文弄墨的人无不接受“文不厌改”的道理。从认识论的角度看问题,剧本的修改是绝对的,是哲学上的否定之否定。汉语的成语很经琢磨,字斟句酌、不留一字,是认可修改的功夫;倚马千言、文不加点,不排除有腹稿垫底。然则为剧本提修改意见,往往不大美妙。这里暂且不谈来自编剧方面的问题,诸如是否谦虚谨慎?可否坚持己见?能否反批评?这里只谈来自领导方面的问题。就我所知,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领导干部(这个量化标准



于是之在工作

是抄袭来的)都认为自己的水平(至少是思想水平)高过编剧,他大概谈不得“两弹一星”,却完全谈得了剧本,更何况手握话语权,正所谓一言九鼎。修改意见,哦,指示,张口就来,居高临下(或曰高屋建瓴),吐唾沫是个钉儿,编剧只有听话的分儿,哪敢龃毛儿?这样“抓创作”,前程怕是不那么美妙。

看看于是之是怎么“抓”的?首先,他说,“要平等待人,尊重他们的劳动”,“不要因为自己是‘组长’或什么‘长’,就端起架子”,其次,“要肯于承认自己不如作者,至少在他所写的题材上,你不如他们懂得多。”他还在私下里说过一个量化的标准,一个剧本,你不看三遍是没有发言权的。我的《李白》上交后,他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研读有关资料。听创作室同事王志安说,他和老于到郊区开会,纳闷老于桌上总是摆满有关李白的书,直到《李白》开排了,他才恍然大悟。

管创作的领导对剧本有看法,十分正常,意见当然要提,这是责任,毋庸置疑;但于是之强调的是:“要跟作者交朋友,要

使作者写得得意了或者碰到困难,卡了壳了,都愿意找你聊聊,没有什么拘束。”有意思的是,在具体修改的过程中,为了剧本质量的提高,许多领导所希望的,恰恰是老于所担心的——“千万不能形成那样的局面:你提什么,他就改什么,‘指哪打哪’,叫怎么改就怎么改,这是绝然搞不出好作品来的。”很

遗憾,所希望的和所担心的,偏是同一个事实!由兹可见人文情怀之品位不同,由兹又见管理水平之高下有别。

日久天长,一部部作品摸熟了,相互之间信任了,这时,有的作者希望老于动手,怎么办?老于说,“有把握可以动”,但他给自己提出八个字:“铅笔改稿,定稿别看。”我们看他是怎么思考的:“你改得好,人家定稿时自然吸收;不好,人家就要用橡皮把尊家的字句擦掉。你不再看了,与人方便,他有取舍的自由;你非看不可,不幸你又是个什么‘长’,碍着面子,就使作者的橡皮多少有点下不去手。何必管那么多呢!人家需要你帮忙时,责无旁贷,就要帮一把;不需要了,趁早躲开,乐得轻松一下,你轻松,他更轻松,多好!”老于的思考如此细微,细微处人格立见!

一出戏的修改似乎是永无止境的复杂劳动,其间交替着否定的痛苦与再造的欢乐,否定的痛苦不过一时,心向往之是再造的欢乐。《李白》初就,老于第一次谈意见,便写了五页纸,大致是提纲挈领式的零断句,包括了性格、情节、细节、冲突、

意境、语言等诸多重大问题,这些意见有老于的睿智,更有老于无私的精神,这些意见大都化为养分,浸润在剧本里。今天重读这些发黄的字纸,令我感慨系之,老于是没署名的编剧啊!忽然想起南方似有一出话剧,戏上演后出版了舞台演出本,导演自署“演出本编剧”,还有人帮腔、敲锣边,真是荒谬而滑稽,当今的世风呀……

三曰尊重剧作家。

我们这个社会不乏高调高唱“以人为本”,关键是必须落到实处;所谓“抓创作”说了归齐,也还是要“以人为本”,尊重剧作家,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于是之一反庸常,不命题作文,不当教师爷,早已体现出他对剧作家的尊重。有一件事让我刻骨铭心,永记不忘。我曾撰文记述过,《李白》修改反复最多的是全剧的高潮——李白与妻子分手,一种情投意合的最后诀别。最后诀别的必然性与情投意合的暂住性形成强烈的冲突,这正是戏剧性之所在!我和苏民导演为这番发现而樽俎交欢。没想到老于看后却不满意。我懵了。又过了几天,老于说他又看了几遍,觉得似乎也只能这么写,他原先的意见收回。我又懵了!鄙人作剧几十年,遇到文化官员无数,愣是没有听说过哪位大员说过意见收回的话!我扪心自问,为什么老于看第一遍不满意,而后觉得还可以?其间有无直觉与思考的参差?戏剧流程不允许思维暂留,观剧自是一次完成,怎能奢望观众再看三看?我终于从老于的第一次直觉中悟

出了毛病,继续修改,改……

于是之说过,他要和作者交朋友。北京人艺人说,创作室是个沙龙。当年于是之住在剧院三楼,类似集体宿舍,创作室的李龙云等与之邻,不远处史家胡同有北京人艺宿舍,蓝荫海、梁秉坤等在焉。大的聚会是每月一次的“组织生活会”,是党与政、公与私“一揽子”的聚会,既有官方的“露布”,也有小道的“信息”,既有艺术的切磋,也有即兴的聊天,偶尔也还搓上一顿。记得《李白》初稿交上去一月有余了,有天我到剧院办事,楼道里碰见老于,他叫住我,让我中午到他房间吃工作餐,我猜到他八成为《李白》的事。果然,待我推门进去,桌上摆着几瓶啤酒,苏民导演正在开瓶子……这顿饭吃得真爽,在天南地北的海聊里,《李白》这个戏定了下来。要说这在人艺也是有传统的,听说人艺建院之初,“四巨头”之一的欧阳山尊就说过,“书记是什么?书记是马车夫加厨子!”马车夫驾车,伺候着艺术家,厨子嘛,中午



于是之在《龙须沟》的剧照

工作餐,给大专家多炒俩儿菜!

平常时候,于是之似乎忧心忡忡,优柔寡断,孰知关键时刻,于是之是一个是非分明而且敢于担当的人!高行健和林兆华的实验戏剧,他坚定地予以支持,一次、一次、又一次,《车站》、《绝对信号》、《野人》……李龙云的《小井胡同》遭遇阻力,风波不息,他义无反顾搬上人艺舞台……何冀平《天下第一楼》成功后,不意斜枝旁出,生出笔墨纠纷,他旗帜鲜明,为之奔走……我加盟北京人艺之前,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他亲自出马,仅仅五天办成了调动……是之大兄,创作室的哥们儿哪个对您不怀知遇之恩?!

谢幕是演出结束的惯例,中外皆然;而首演结束编导上台谢幕,除北京人艺外,全国并不多见。我不知道北京人艺编导谢幕是否始于于是之当政时期,但我顽固地认为,此现象与于是之们尊重剧作家

的思想紧密相关。我也曾给外地写戏,而且也在外地隆重推出过,但首演时候上台谢幕的却不是编导,那里演艺集团的老总谦卑地延请省里领导上台,大员们一个个气足神完,仿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哟,他们有资格接受观众的掌声?这位老总就在我身旁不远处,却有意视若无睹,我报以鄙视的目光,这样的老总今后还能合作吗?我不被这样的老总放在眼里,我没有自卑,恰恰相反,我感到自豪,我是这出戏的编剧,这出戏的每一个字都出自我的心中、我的笔下,我感到幸运,我有幸生活在人艺、创作在人艺,我得到于是之们真诚的尊重,仅此,足矣!

于是之如何经营人艺“小作协”,为避免忘却,我袭用“党八股”的套路,总结出“两不一尊重”:不命题作文,不当教师爷,尊重剧作家。事往矣,大兄是之今仍在,只是不见了翰墨酣畅、樽俎豪情……

补白

毛泽东要社会学“断子绝孙”

解放初大学院系调整时,社会学专业被取消。费孝通在中南海向毛泽东谏言:“希望不要让社会学断子绝孙,多少留一个种,留点苗苗。”当时,毛泽东的手势和语气都非常干脆:“不能留,坚决断子绝孙!”以南京大学为例,社会学家孙本文去了地理系搞经济地理,曾任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柯象峰到外文系当了普通老师。南京大学的哲学系经过数十年的惨淡经营,曾一度集中了许多全国知名的学者,但正如祖庆年先生所说,一九五〇年代院系调整后,“哲学系竟失去了存在的余地,老老青青,统统给扔出了南大的大门。”

徐佛观，国民党少将观察员的延安观

◎朱鸿召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徐复观作为一位台湾学者被介绍到大陆，其著述《中国艺术精神》《两汉思想史》等在当时的知识界和读书界颇得清誉激赏。近年来我在研读延安学文献中，获悉这位徐复观先生，曾经名为徐佛观，以国民党少将观察员身份受命派驻延安，写下见识深刻的观察报告，当时就受到蒋介石的关注。时隔近七十年，仔细研读之，仍然让我为之心生崇敬。

看过延安，把脉点穴国民党

一九四四年三月，蒋介石在一份关于延安的观察报告上批示：“此乃本党某同志对中共情形实地考察所得之结论。某同志一面为三民主义之忠实信徒，一面对党派问题，素无成见；故其所得结论，较客观而深刻。某建议部分，亦颇有独到之处，可发人深省，故特为印发，供本党负责同志之阅读研究。其中所加之圈点，皆寓有深意。深望因此而能有所启发奋勉也。”^①这个批示印成小册子时作为编者“序言”出现在扉页上，内容中多处圈点文字，显示当时国民党最高层对其极为重视。

这份关于延安的观察报告，就是时任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派驻第十八集团军少将高级联络参谋徐佛观，在经过半年的观察研究之后，所撰写的一份对于共产党和延安革命队伍的所见所闻，以及对于国民党和重庆国民政府的反思反省意见书。唐纵当时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任职，他在日记中记载，徐佛观“一九四三年返重庆，写了一份对延安及共产党军队的观感报告，蒋极为重视，作眉批，印成小册子。徐曾于一九四五年初在侍从室二处六组工作，后任中央乙级会报联秘处副秘书长”^②。张令澳曾在侍从室二处工作，他回忆，“此人专门研究中共问题，调回重庆后，蒋介石几次召见他，详细听取他汇报在延安情况，甚感兴趣。徐佛观写有一份对中共内部情况分析的报告，蒋认为‘见解独到，分析透切’，对这份报告反复阅读，并在精辟处，加了不少圈圈、点点和批语，予以赞赏。事后就派徐佛观进第六组（处），主持对中共问题的研究”^③。徐佛观受派到延安时期，正值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国民党借机渲染要求中共退出政治纷争，而处于整风运动高潮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掀起更加猛烈的抗议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示威活动。在



徐佛观(1903-1982)

国共双方政治纷争的历史舞台上,徐佛观有机会亲身观察体验两个政党阵营里的情状,虽然完全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但是他对两党纷争问题的观察思考,却有一个民族国家情怀所在,所以看得更远,想得更深,也更加发人深省。

今后为求有效之处置,须先承认以下之事实。斗争而不承认现实,则其第一步已归失败矣。

1. 在精神上与行动上,中共今日系以绝对性、全体性对我,而我仅系以有限性应之。

2. 在彼势力范围内之民众,虽万分痛苦,而一草一木不能不为其效命。在中央势力范围内之民众,虽万分宽大,而其地位能接近政权者,在事实上,反多为蛀蚀政权之人。其无机会接近政权者,则更为蛀蚀政权之分子所压抑,无由窥见中央之本体。故彼能扰乱我之社会治安,而我反不易拯救彼榨压下之民众。

3. 彼可伪装民主政治之外形,以欺骗国人、国际;而我则既不能拒绝民主,复未能灵活运用之。

4. 战后我以和平安定为有利,彼以混乱分裂为有利。求混乱远较求和平为容易。

5. 抗战以来,敌后彼我斗争之现象,在我方最先为党之失败,其次则为政之失败,最后则为军之失败,恰与彼之发展过程相反。^④

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徐佛观断言,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之间必定有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和较量。“与奸伪之斗争,不全胜即全败。全胜则奠定国家民族千百年太平之基,全败则沦数千年文物为异类,其中绝无中和之理。将来斗争正式展开以后,其惨烈远过于往时。”^⑤“国民党像目前这种情形,共产党会夺取全面政权的……不改造国民党,决没有政治前途的。”^⑥这对居于抗日建国领导地位的国民党,对处在政权正统地位的国民政府,无疑是当头棒喝,警世危言。并且,对于这种严重危机,徐佛观认为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以及民主派中间力量目前所提出的各种政治解决方案,都是无济于事的。“然则此一问题,果能以政治方式解决乎?本人曾以各种方法,探索彼方(共产党方面,引者注)之真正意见,始知不特中央(国民党方面,引者注)所希望之政治解决条件,不能达此目的;即社会粉红色人物所想像之条件,乃至共党自身今日所公开主张之条件,亦决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凡了解共党之本质与历史者,皆可认此为当然之事。中共对内部宣传,短则五年,迟则十年八年,必统一中国。彼心目中的革命

与政权,系绝对的而非相对的。”^⑦这里所说的“粉红色人物”,是指当时同情共产党的民主派中间力量代表人物。既然各种政治方案都解决不了问题,那么,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一场军事战争带来的总较量,就不可避免。

如此判断,如此警示,在国民党高层部分参与决策者当中,所引起的骚动和震动是甚为强烈的。“十八集团军联络参谋徐佛观新自延安归来,历述延安荒谬狂悖之情形,令人愤慨。据徐佛观观察,非用武力不足以解决。任何方法,徒托空言。而用武力,在目前政治现状下,前途并不可乐观!”^⑧危机当前,对对方采取漠视、咒骂、丑化的情绪化态度,都是非理性的。徐佛观高出常人之处,是保持理性的态度,对事态做出比较深入的研究,做到“入木三分骂亦精”。

据徐佛观观察认为,延安掀起此次针对“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抗议活动,相比较而言,其军事攻势小,政治攻势大,达到的主要效果是,“增强其干部军队对中央之敌忾心,使彼可随时采取任何行动。在自卫口号之下,完成社会组织之彻底军事化”。如果说前者是针对国民党作和谈破裂后的战争准备,后者则是借以完成整风运动的重要推动力。“整风运动即系一元化运动,即系思想一元化、领导一元化、工作机构一元化之运动”。对此,徐佛观认为这是日本侵略者自一九四〇年开始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大扫荡”的客观环境造成的。“敌人以一元化之方式,向其扫

荡,甚收功效。于是彼乃提出以一元化对一元化之口号,更转而对付中央。”这种理解未免有些片面,但是他关注到这种“党、政、军、民(民众团体)之领导权,一元化于党;而其工作之目标,则一元化于军”^⑨,其结果可以大大提高团队执行力。“其领导之方式,在党内确系采取民主集中制,及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⑩这对于组织纪律性涣散的国民党军队来说,是望尘莫及,自叹弗如的。

党政之配合,在政策方面,则以同级之党或党团控制党员,以党员控制政策,以政策控制政权之活动。在实行方面,则党团率其党员,尊重其政府之表面决定,不仅率先躬行,且随党组织之深入社会,而党员之行动亦深入社会;于是每一政策之实施,政府由上而下,由外而内;党则由下而上,由内而外,以联成一气。^⑪

这种党与政的默契制约,相互配合关系,是蒋介石政权始终没有妥善解决好的难题。徐佛观提供的延安经验,为蒋介石拨亮了一盏成功的明灯,尽管有些遥远,但是眼前为之一亮。

与此相关联,在执政党和政权对于整个社会控制力方面,徐佛观将延安经验与国民政府统治模式相对照,发现国民党政权只能称得上一个“半吊子”组织,横向不能到边,纵向不能到底,县级政权以下基本上掌控在士绅土劣手中。“县政府以上



1937年5月,国民党中央代表团到延安考察,与中共领导合影 左起为:萧致平、毛泽东、涂思宗、朱德、邵华、叶剑英

者为乡原(愿)政治,县政府以下为土劣政治。不仅不能形成国防、经济、文化凝为一体之坚实社会,并亦不能与现实之军事要求相适应。”所以,必须学习延安整风运动建立起来的中共一元化领导体制,“以一元化对一元化”。¹²

中共之秘诀,在于以农民党员为发展组织之对象,故其组织能深入于社会里层。党之组织深入于社会里层以后,第一步先以各种方式变社会为绝对之战斗体,由此战斗体中以产生军队,发展军队,于是军队遂能与社会结为一体。我方则因党未能在广大之社会生根,故政治亦不易在社会生根,因之军事力量亦无法在社会生根,而浮出社会之上。是故在其选定之时间内向我攻击,则如潜水艇之攻击武装商轮;在其控制之空间内以行防御,则能深藏于九地之下。此其原因,不能仅求之于军队之本身,而必须追索其泉源于党之组

织方向,及党政工作目标之单纯一致。抗战以来,作者在敌后考查,遍历七省,加以此次在陕北之体认,乃得出此一结论,自信已握此问题之核心矣。¹³

所以,在徐佛观的考察报告中,尽管他坚定地站在国民党的政治立场上,偏颇狂傲地认为,“中共系由中国社会之弱点所产生,而非由社会之需要所产生”¹⁴,企图从理论上取消共产党存在

发展的合理性。但是,其自相悖论的是,在同一个报告中他又承认,“中共为社会问题,非一术一策即可收效”。为此,他提出必须改变国民党的组织发展方向,把已经沦落为局限于知识分子的“书生党”,转化为包括中产阶级、自耕农和其他劳动者在内的全民社会党。

党团为国家民族之大动脉,新血轮。然血液之循环,若仅及半身而止,则必成为半身不遂之人。今日现象,中央有党团,至省而实际效能已减,至县则仅有虚名,县以下更渺然无形无影;是党团之组织,乃半身不遂之组织;党团之活动,亦成为半身不遂之活动。故奸伪可以控制社会,会门可以控制社会,土劣可以控制社会,迷信团体可以控制社会,而本党党团员之成分,仅以知识分子为对象,于是党团之组织,亦自然仅以上层为对象。……